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3.3

5 issues a year in 15 languages

社会学作为志业

Raewyn Connell,
Randolf David

革命与反革命

Nazanin Shahrokni,
Parastoo Dokouhaki,
Simin Fadaee,
Abbas Varij Kazemi, Mona
Abaza

危机中的大学

Satendra Kumar,
Klaus Dörre,
Stephan Lessenmich, Ingo
Singe

- > 墨西哥都市暴力的常态化
- > 墨西哥青年的社会分化
- > 当代日本的不平等
- > 简单的美：俳句
- > Bilba的执行委员会议
- > 介绍波兰团队
- > 加拿大社会学欢迎各位
- > 给主编的信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3期 / 2013/5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编的话

危机中的大学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时，Raewyn Connell 正在 University of Sydney 解释社会学作为志业的含意。她也加入学术和行政人员的罢工行列，抗议终身职的缩减、临时约聘的增加、以及对大学自由的威胁。这是全球的大学所正面临的问题。

当大学从公共财变成私有财时，大学就开始贩卖商品给顾客。顾客包括了学生、国家、企业、以及任何可以兜售其商品的对象。争取顾客上门变得很竞争，所以大学就要拼命挤入世界排名。学者或许不喜欢这些排名，可是还是要想办法竞争到底。这意味着不只要发表到英文期刊，还要发表到国际都接受的期刊才可以。这些期刊都是美国或英国的国内期刊，拥有权力并用他们自己国内的模式设定问题、议题、方法。南方的社会学者因此脱离自己的社会越来越遥远。

很少人有资源、有勇气、或是有兴趣去挑战这个结构。所以，这期全球对话中我们看到的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y 的社会学家和德国社会学会抗议其国家的学术排名，的确值得我们大声喝采。别忘了，有很多大学甚至不在名单之中啊，这些学校有如消失一般。Satendra Kumar 检视了在印度的 Uttar Pradesh 中政客如何设立野鸡大学、赚取国家的学费补助，发给毫无价值的文凭。在此，公共资金全都进了政客私人的口袋。大学变成赚钱机器。这虽是 University of Sydney 的另一个对立面，不过面临的结构压力是相似的。

当然，大学也面临许多传统的危机。Nazanin Shahrokni 和 Parastoo Dokouhaki 描绘了伊朗政府为了控制女性入学名额而产生的非预期恶果。而伊朗的绿运动者在 2009 年就是从这些大学中毕业的 (Abbas Varij Kazemi 和 Simin Fadaee 的文章)。不意外地，伊朗政府仍紧盯着这些大学。

这些案例中我们看到社会和大学之间的界线变模糊了，我们不能老是假装我们不是社会中的一分子。所以，我们必须选边站。我们要和市场站在一起，还是要和公众抗议者站在一起？Randy David 对于社会学志业的讨论让我们看到，即使在菲律宾这个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学者仍是可以介入公共领域进行批判。不过，要进入像是埃及和墨西哥这种暴力常态化的国度去从事批判志业，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与决心才可以。总之，我们在这边说的这些或许不中听，但我想这总比默不作声好上太多。

全球对话以 15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Raewyn Connell 是澳洲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也是 *Southern Theory* 一书的作者。她认为社会学者是劳动大众的一员，而学术正被资本主义侵蚀中。



Randolf David 著名的社会学家，描述公众社会学的批判与投身政治有多么不同。



Nazanin Shahrokni 和 Parastoo Dokouhaki 说明伊朗的大学女性人口增加如何导致性别隔离，以及国家机器怎么保护男性劳动市场。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编辑顾问: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ğ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Yoshimichi Sato,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Célia da Graça Arriba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Rossana Marinho,

A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Katherine Gaitán.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hahrad Shahvand, Saghar Bozorgi,

Najmeh Taheri.

日本:

Kazuh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Takako Sato,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Yutaka Maeda, Shuhei Naka.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Zofia Włodarczyk,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Justyna

Witkowska, Konrad Siemaszko, Julia Legat.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Ileana-Cinziana Surdu, Lucian Rotariu,

Angelica Helena Marinescu, Adriana Bondor, Alina Stan,

Andreea Acasandre, Catalina Gulie, Monica Alexandru,

Mara Șerban, Ioana Cărtărescu, Telegdy Balazs,

Marian Mihai Bogdan,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ș,

Ramona Cantaragiu, Elena Tudor, Monica Nădrag.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Ekaterina Moskaleva,

Julia Martinavichene.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乌克兰: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Polina Baitsym,

Mariy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tsova, Daria Korot-

kyh, Mariya Kuts, Lidia Kuzemska, Anastasiya Lipinska,

Yulia Pryimak, Myroslava Romanchuk, Iryna Shosta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i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Mariya Vorotilina.

编辑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媒体顾问: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危机中的大学	2
社会学作为志业: 全球共同合作 by Raewyn Connell, 澳洲	4
社会学作为志业: 批判性地参与公共领域 by Randolph S. David, 菲律宾	6

> 革命与反革命

伊朗的大学的性别隔离: 反作用力 by Nazanin Shahrokni, 美国; Parastoo Dokouhaki, 伊朗	8
伊朗绿运动的背后主角? Simin Fadaee, 德国	11
挪用历史: 伊朗的绿运动 by Abbas Varij Kazemi, 美国	13
埃及反革命的暴力 by Mona Abaza, 埃及	16

> 危机中的大学

印度大学成为营利机器 by Satendra Kumar, 印度	19
德国社会学家抗议学术排名 by Klaus Dörre, Stephan Lessenich, and Ingo Singe, 德国	21

> 墨西哥

可绑架性: 墨西哥都市暴力的常态化 Ana Villarreal, 墨西哥、美国	23
墨西哥青年的社会分化 by Gonzalo A. Saraví, 墨西哥	25

> 日本

当代日本的不平等 by Sawako Shirahase, 日本	27
简单的美: 俳句 by Koichi Hasegawa, 日本	28

> ISA

Bi Iba的执行委员会议(2013/3/10-16) by Michael Burawoy, 美国	30
介绍波兰团队 by Karolina Mikołajewska, 波兰	33
加拿大社会学欢迎各位 by Patrizia Albanese, 加拿大	35
给主编的信 by David Lehman, Hilary Rose, 英国	37



> 社会学作为志业

全球共同合作

by Raewyn Connell, University of Sydney, 澳洲



Raewyn Connell.

Raewyn Connell 是澳洲社会学家。她的研究包括了阶级权力、学校中的性别与阶级关系。她著名的作品包括 *Gender and Power* (1987)。像是 *Masculinities* (1995) 则全球知名，其中霸权男子性是最为广泛引用的概念。Connell 对历史社会学始终抱持高度兴趣，而且对于北方理论与主流社会学有着强烈的批判。其高度争议性的文章 *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 后来发展成专书 *Southern Theory* (2007)，呼吁重视南方理论家。若这些上述著作有共同的交集，那我想就是她认为知识必须被放在其生产的脉络下才可能被理解。更多请到 <http://www.raewynconnell.net/>

若你是社会学家，那么你也是劳动者，你有工作，是劳动力的一部分。理解这点可以帮你从豪华壮丽里除魅，也让你思考你和其他工作者的关系。你的工作就是生产知识，教学，然后运用知识。这是一个集体的工作，不是个人的事业。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一样，目的在于分享知识，其本质就是公共的。传递知识是公共行动。你透过对于社会的了解，贡献给整个社会，这也是你为什么是社会学家的理由。

> 寻觅社会学

我 1960 年还是学生的时候，没什人在教社会学。我有个历史系学位，然后有另一个政治系的学位。这些是很好的训练没错，问题是当时整个世界已经在沸腾了。所以我参与学生运动，反越战，挑战大学的保守主义。我们要求更多的更入世、更有价值的知识。所以我们自己动手，要成立一个业余的自由大学去做这件事。

我博士毕业后到了美国，到了一个知名的社会系，想找答案。我发现该系分裂成激进的学生和保守的老师。该学校因为学生罢课而关闭了。但我读了很多很棒的书，像是 Lévi-Strauss, Sartre, Mills, Gouldner, Lazarsfeld 等等。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是男性，都是白人，都是所谓的北方理论。因此后来我想接触更多其它的作者，就阅读得更广泛。

后来回到了澳洲，我参与了一个新大学成立社会系的计划。我们一群人可以从无到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系，是何等幸运的历史时刻。今日虽然对于教师的限制越来越多，不过还是有空间给予创意课程的发挥。

> 制度

在澳洲，大约一半的的大学课程都不是终身职

>>

教授在教的。许多高学历的年轻人只能做些临时的工作，教一些课，在两、三个大学之间兼差。谁会把这个称作志业？何况许多发展中国家中连终身职教授也在兼差。

从这个观点看来，你要学者为社会学奉献，简直强人所难。你要他们兼差，然后还要发表期刊、参加会议、主持计划、然后参与社群？可是新自由主义就是喜欢衡量个人的工作绩效，不管你的工作环境。他们看你的声望排名，看你可以拿到多少钱的计划，看你写了几篇文章等等，这些就是大学里的筹码，就像企业界里的个人表现一样。40年前，Claus Offe 在一本杰出的著作 *Industry and Inequality* 中就说到这个世界疯了。组织那么复杂，其实很难去理性的判断什么工作成果是归功于谁的。这个观点其实来自于社会学，只是我们的专家们大概都忘了。

反过来，我们看到的是业界渐渐占领了学术，把个人职业生涯塑造成好像就是志业一样。企业家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总会说他们愿意为了股东和公司不惜一切打拼，然后这个热情到了被挖角那一刻马上就消失了。在大学里面要赚大钱不太可能，不过真真实实地分享我们所知道的、切身相关的重要知识，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了。

> 社会学知识

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学术界可是大有问题。社会学思想从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和 20 世纪的经验主义累积而来，也受到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启发，以及被一些知识派系像是功能论或是解构主义所影响。社会学理论是相当欧洲中心的。社会学研究很机械化、一直在重复。计算机本来是用来处理数据用，可是却取代了你对真实问题的理解。就像 Thandika Mkandawire 所说的，在发展国家的社会学就像是对穷人的穷研究：没钱、短期、不够深入。

所以社会学需要先批判社会学。我认为要掀起这个北方社会学的霸权，首先要把南方社会学理论和后殖民理论带入。当然，对于这个看法的反动非常强，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北方社会学已经整个制度化，有那么多社会学家靠这个吃饭。对抗起来，当然不容易。

社会学研究其实很难，我的意思是，很难做得好。我建议我的学生把教科书放在书架上就好，直到你要说何谓斜角转轴的时候，在拿出来看就好（对初学者的建议：忘掉斜角是什么吧）。每个研究问题都是新问题，有重要性，不同的资源也在手边，诠释也重要。学习方法最好的方式就是动手去做。其次是阅读好的文章，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每个人都有他们心

目中最好的作品排序。我的是：Barrie Thorne 的 *Gender Play*；Robert Morrell 的 *From Boys to Gentlemen*，以及 Gordon Childe 的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所有这些作品都是非常辛苦努力的结晶，包括了长期的浸淫、大量的资料。没有了这些，社会学想象只是空转。

> 读者与公众

几天以前我参加了一个午餐约会，去访问一群年长女同志，她们叫做 55 Uppity (<http://55uppitty.com/>)。许多 Sydney 的女同志摄社群其实很快乐，谈论世代交替，要让年纪变得明显。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社群正在想象自身，而且还是一个知识计划的重新建构。

很多时候社会学家希望他们的作品有用，特别是针对其研究的特定群体或是制度。我有过很多这种反身性很强的研究计划，包括了研究性和 AIDS 防治在澳洲的实践 (Kippax et al., *Sustaining Safe Sex*)。还有教育不平等，主要对老师和政策制定者 (Connell et al., *Making the Difference; Schools & Social Justice*)。

在大学教书的社会学需要和其他群体有所连结，特别是那些运动社会学知识的群体。所以我很珍惜我和劳工运动长期下来的连结，他们也觉得我们对阶级的研究很有用。此外还有老师与教育者，他们会觉得我们的教育研究有用。我学术生涯的后期其实是和教育学和社会工作有关，而不是在社会系。但是，潜在的读者更是宽广。有些社会学则进入媒体，有些透过网络、出版、翻译、旅行、还有谣言传播出去。当我知道有在巴西、爱沙尼亚、中国的读者想联络我，我相当高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社会学可以是全球志业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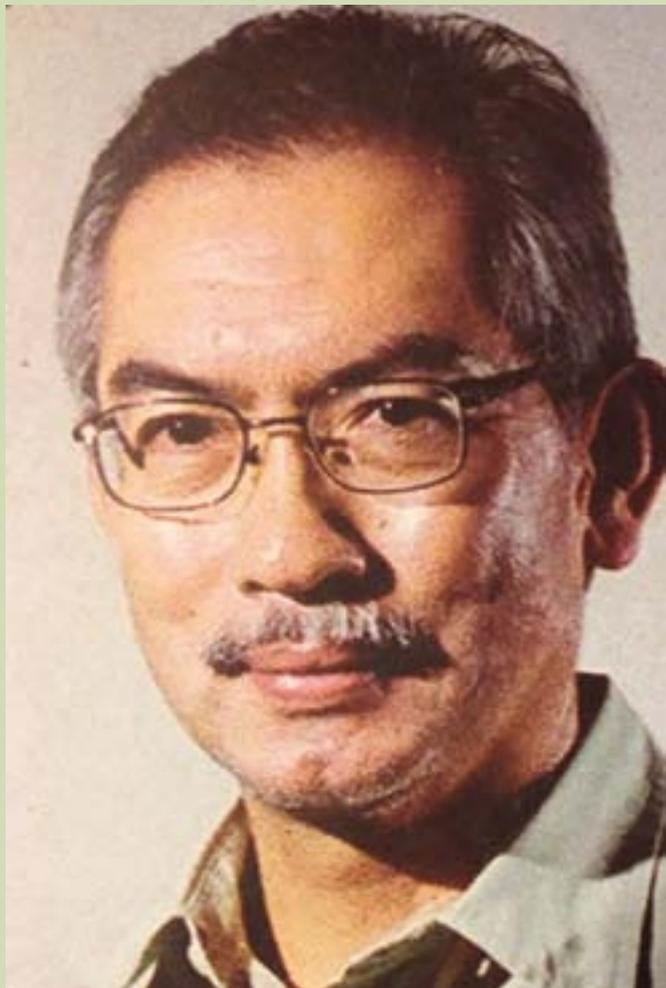
> 基本的目标？

我从事这行是因为我觉得社会学生产了关于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知识，像是暴力、不平等、灾难等等。我至今仍这么认为。社会科学可以扮演一个推进民主的重要角色，是社会自身知识的核心部份。我从中已经学到生产知识是多么困难，以及知识要有用也相当困难。我也了解到必须从“全球的角度” (Samir Amin 的话) 去思考这些议题。这是个令人望之却步的观点，但是很有启发性。若社会学是志业的话，那一定不是什么传统宗教式的个人召唤，而是集体、全球的努力。 ■

> 社会学作为志业

批判性地参与公共领域

by Randolph S. David,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菲律宾



Randolf David.

Randolf David 是杰出的公共社会学者。他的著作：“民族国家、自我、公民身份：菲律宾社会学”得过许多奖项。他也是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周日专栏“公共生活”发表在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上，而且从 1995 年就开始了。此外，他还主持公共电视的节目“公共论坛”。他是社会学学生口中的传奇，也把社会学的视野带到公众之中。

社会学不是我的初恋。我会说我学社会学是出于理性，而非知识的理由。我 1960 年代在菲律宾大学念书时，是想当律师的。我爸是律师，而且我认为律师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可是现在的学生到了学校都不是为了学习专业。

若一个人想要念法律，那么先修科目必需是政治学或是哲学，或是其他的社会科学。法律预备班的要求可接受任何的大学学位。这让念社会学的学生受惠良多。

我原本是主修英文系，毕业后是想当记者的。但是我夜间部修法律课。但是当时还年轻，志向很大。我大三时修了社会学导论课程当选修科目，因为该门课很甜，可轻易拿高分。我那时必须利

>>

用这科去拉我的平均才行。

后来，我却爱上了社会学。在课程结束很久之后，我把课本重新拿出来翻。大四时，在我爸反对下，我转到社会学。这是个意外插曲，却决定了我此后的人生。我在社会学课程里面遇到了我后来的妻子，而我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则完全转变了我的政治立场。法律或许可以让我有稳定的政治生涯。如果我念法律，那么我就会跟现在台面上很多政治人物变成同学。

社会学给了我观察菲律宾这个年轻社会很多的工具。藉由 Hannah Arendt 的话来说，我认为我被 pathos of wonder 所吸引，那就是观察的惯习，必且不要找寻解决问题的快速解答。这也和激进的思想有关，在 60 年代其实社会学家很难不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一样。后者必须服从革命的教条原则，限制了反思的能力。而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则可以解决列宁政党的问题，因为他不会忘记反身性的思考。此外，他也会总是不忘记观察，因为观察比行动要先。不同于意识形态，其自身的行动也是观察的对象。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实践从来就不是社会学的标志。人们不会因为实践的理由而喜欢上社会学。社会学主要的承诺是二阶观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学家的态度去了解社会，而非焦虑怎么有那么多社会问题没有解决。

这就是社会学不可逃避的立场。我们要去问是否在一个发展中社会有一个学科可以着重观察而非解决问题。的确，我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已经无数次了。

我仍然要说，一个学科致力于观察而非解决问题，对社会是很重要的。观察也要质疑暨有的框架。政治的志业需要的则是不同的东西。你若是总是致力于分析社会，那么你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政

治人物。我认为反身性是政治最大的敌人。

我认为我很早就知道这点了，可是我错了。2009 的某个时间点，我认为当时很不受欢迎的总统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会竞选国会议员以保住其摇摇欲坠的政治生命，而我想阻止他的办法就是自己也去参选。我们在同一个选区。可是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错误决定。

当我知道时，我发现我把自己投射成勇士戴维，想要打败巨人哥立亚。这是多么英勇的故事啊！这就是救赎般的伟大。可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我完全不知道跨界的风险所在。我从来没有参选过，也没钱，要怎么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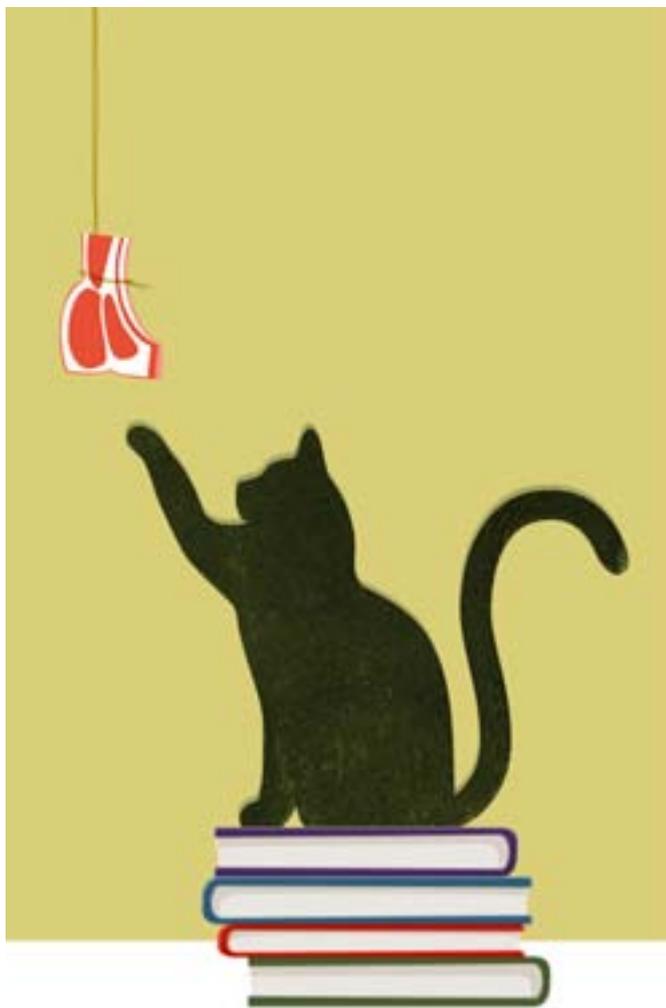
总之，我对于传统政治可谓外行。我知道我面对权力时，我一点欲望也没有。但是当时我开始准备进入一个完全新的世界，完全陌生的领域。有一天当我要填参选表格时，我毅然决然决定退出，因为我不想牺牲家庭时间。我的决定被许多我的朋友骂翻了，因为他们决定要去打一场伟大的战役。

以知识作为武器，社会学家可以在公共领域发声，也会发现自己始终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若你还想当社会学家，那么必须避免成为一个政治人物，避免加入政党。社会学家的志业是去审问政治，而不是去竞逐权力。■

> 反作用力

伊朗的大学的性别隔离

by Nazanin Shahrokn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Parastoo Dokouhaki, journalist, Tehran, 伊朗



Arbu绘。

2012年8月6日，当新的学期年度接近时，伊朗政府支持的 Mehr News Agency 发表了一份公告，说明36所大学把女性排除在77个领域之外。这个公告引起了国际之间的愤怒。流亡英国的伊朗人权运动律师、诺贝尔得主 Shirin Ebadi 写了一封信给联合国秘书长 Ban Ki-Moon 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长 Navi Pillay 要谴责说：“伊朗的政策逼迫女性要待在家里，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不被接纳。” 国务院发言人 Victoria Nuland 在8月21日阅读的声明之后要“伊朗政府去保护女性的权力，并且负起伊朗的国际责任，就是不要保证没有歧视及平等的教育机会。”

在伊朗，高等教育的官员拒绝性别歧视的指控。总理 Kamran Daneshjoo 认为这种指控的说法是西方世界媒体的煽动，像是 BBC 或是 VOA。他说：“他们会生气，那就表示我们做得是对的。” (1)

那学期即将开始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把伊朗和西方对立起来的局面是很虚假的。新的禁止命令其实影响到的不只是女性，还包括男性。这造成了长期以来的性别隔离局面。如此的作法像是倒退到早期伊斯兰共和国时代一样。在1980黏得时候，国家试图要在物理空间上把女人跟男人分离，特别是在校园内。其所秉持的观念是若把两性混合，尤其在家以外的空间，那么就是“非伊斯兰”的，以及是背德的。今日，那些强硬派想要继续“伊斯兰化”化整个校园，也想要解决一个意外的历史后果：校园的女性化。这新的性别隔离政策主要是在为男性设想，在教育、婚姻、工作皆是如此，而且是想要转移国家经济不景气和高失业率的注意力。

> 魔鬼藏在细节里

>>



在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Khamenei阴影下的女人

所谓的性别隔离很复杂，但是主要都在校园里面执行。

许多大学扩张了性别保护名额。这向制度造成了伊斯兰共和国第一年的深刻影响，藉此，许多特别的空间只分配个单一性别。例如，Tehran 大学普遍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把教室一半的空间给男性，另一半给女性。这样一来就是一个 50-50 的系统。Shahid Beheshti 大学位于首都，则有 110 原则：60 给女性，50 给男性。

其他学校则被化分成男性和女性两大块，至少在理论上是两个平行的空间。男性在秋季班入学，而女性在春季班。而实际上这种管控和分离政策不被执行的时候，两性是混合的。例如 Arak University 位于伊朗中部，Lorestan University 在西区山部，两所学校就是如此。他们是很乡村的学校，并实施这种政策。伊朗当局通常都用偏远的学校去实验这种争议性的政策。

而其他大学则保留了许多男性特权的空间。而理由都是为了某种经济或文化的缘故，因为传统文化把“男子性”视为相当重要。只有男性可以进入的单位可以得到媒体的青睐，但是许多制度也保留了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女性专门空间”。在 2012 年，Shahid Chamran 大学就不招收男性到历史系、波斯文学、心里、教育等系。

可是这一切看不出来是一种新的性别隔离政策。许多大学似乎武断地采用这种政策，并且划分何谓男性，何谓女性的界线，负面影响相

当大。

性别隔离不是只有发生在入学许可而已。在 1980 年代，极端主义者和伊斯兰共格国一起要求教室必须落实性别隔离，而且在许多场合，男女就被用区隔物一行一行地隔开。伊朗革命的领导者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据说反对这种方式。于是没有了区隔物，可是性别还是继续隔离着。这些例子可以在路上、教室、图书馆、咖啡厅中看见，有标记指着“姊妹”或“兄弟”可以去的区域。有三种限制因为难以执行而随着时间消失了。学术部长 Daneshjoo 想要恢复这些限制：“从这个学年度开始，男性和女性将会分开坐，各个学院要督察是否落实。”(2)

Daneshjoo 也继续向 Majles 和国会的神职人员倡导这个政策。整个部会说这个目标是为了建立只有女性的大学。(3) 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看到这种性别隔离的现象，也要持续观察是否这会带给女性正面的影响。女性或许可以从此增加自己教育取得和职业取得。

> 棉花与火，肉与猫

Daneshjoo 在面对反对声浪的时候说道，性别隔离政策是“Supreme Leader 所期盼的事情。”(4) 的确，尽管 Ayatollah Khamenei 反对使用区隔物，但是却很支持性别隔离的理念。在 Mohammad Khatami 的改革政府之下也是如此。Khamenei 责备其科学部长，说道：“世界上是有很多国家主张性别混合，可是这里是伊斯兰国家，我们国家不主张那样！”(5) Khamenei 的代表人 Hojjat-ol-Islam Nabiallah Fazlali, Khamenei 有一次在 Tehran 大学回忆到他的“痛苦记忆”和“不正常的校园友谊”时，说“女性和男性就像棉花和火”，继续说道，“若不把两者分开，棉花会起火！”而男女之间的吸引是“自然且性欲的”。若是“当你把一块肉丢给猫，猫会不吃吗？怎么可能！”(6) 男性天生就是会把女性吃掉，很明显，宗教的担忧是男性。

在 2012 年早期有一个宗教电视节目，主要针对青少年。Hojjat-ol-Islam Naser Naghavian 是 Khamenei 文化代言人，在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任教，他说曾经有个男性青年学生问他，“当坐在一个女性背后有性冲动时，是被允许的吗？”Motahhari 呼应说道：“若男女混合，那么性关系就该被允许，像西方那样。否则，压抑性冲动会造成许多心理问题！”(7) 所以在这些人眼中，若是两性自由地相处，男性就无时无刻必须压抑性冲动。这个道德的逻辑就在于：若猫不能吃肉，那么作法就是把肉拿开。

>>

> 现代女性的阴影

对于性的管制并不是性别隔离背后的唯一动机。在1998年，女性在大学入学数量上超越了男性，这是伊朗史上头一遭。女性所站得比例已经逐年上升，整个女性化的方向并不限于大学教育这一块。根据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女性文化分会的 Fereshteh Roohafza 之说法，过去已经有 269% 的女性教育比例的增加，而且若看硕士，成长则高达 26 倍之多。(8)

政府单位和国家审查的新闻单位总是引用女性识字率的高升来说明伊斯兰共和国是支持女性的。而在权力核心内部，统计数据则引发很多焦虑。国会的教育委员会成员 Tayebbeh Safaei 就担心女性教育比例的增加。他说“这些平等的的数据会造成社会危机！”(9)但，什么叫做社会危机？所有其他的保守派媒体都说男性正在失去教育优势和工作机会。事实上，男性还是在工作市场上有很大优势。可是这样的言论总是引发一些男性荣耀论者的共鸣。“很显然，男性变成了年轻的伙伴，Whipped 则最可以用来描绘当代男性。女性是中心，就像太阳，而男性就像卫星，没用，屈从，如月亮一样，只能反射太阳的光芒。”(10)

> 保护男人和国家

2012年9月15日，国家出版的杂志 Hamshahri Javan 的一期中说到了女性的成功，但是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主要的封面标题是：“举起手来！女性占领了社会：大学、运动、工作！下一个在哪里？”

有一个女孩拿着一把步枪，低头看着男孩，其阴影正好面对着墙壁。这样的图案来自于1990年的日本卡通 My Daddy Long Legs，是以1912年美国小说 Daddy-Long-Legs 为蓝图撰写的（作者 Jean Webster）。整个故事在说一位叫做 Judy Abbotts 的女孩因为一个有钱的男人而上了大学。这个讯息是想传递：伊朗的 Judy Abbotts 还没有位男性作到什么，反而威胁了男性的地位。

伊朗高等教育的女性化深深镶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而非政治的影响。反对性别隔离的社会运动不仅仅来自学生、老师，还来自于保守派妇女团体。批判相当的激烈，以至于一些大学像是 Shahid Chamran 已经取消了原本的禁令。

同时，从伊朗媒体得来的证据显示官方还是坚持性别隔离政策，因为其主要关心的还是男性会受到威胁，不论在教育或工作上都是如此。

国家想给男性生机，而不是要跟女性说再见。这不是关于男性的感觉而已。伊朗正处于经济危机中，失业率攀升，所以强硬派所掌控的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去平息失业男性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与动荡。这，我想才是伊朗政府最害怕的事情。■

- 1.Khabar Online, August 12, 2012.
- 2.Fararu, July 7, 2011.
- 3.Fars News Agency, July 5, 2011.
- 4.Student News Agency (Iran), October 24, 2011.
- 5.Radio Farda, November 20, 2009.
- 6.Parsine, July 6, 2011.
- 7.Khabar Online, October 1, 2011.
- 8.Fars News Agency, February 10, 2012.
- 9.Tebyan, July 10, 2012.
- 10.Rasekhoon, April 30, 2012.

> 伊朗绿运动的背后主角？

by Simin Fadaee, Humboldt University, 德国



纪录片The Green Wave的海报，描绘绿运动

伊朗的绿运动是在 Mahmoud Ahmadinejad 的支持者于 2009 年大选后占据街道后开始的。一开始他们抗议选举结果。抗议者把自己转变成复杂的人民运动，如此一来在文化上更有积极意义。在持续对于中东社会运动的辩论之后，我想要解释伊朗绿运动的社会基础。我认为，

真正的主角是我所谓的“后伊斯兰氛围”。这个氛围是绿运动的核心。类似的氛围也可以解释其他阿拉伯世界的社运。

绿运动必须被放在全国社会运动（改革运动）的脉络下来理解。这个运动从 1990 年代开始兴起。此外，运动是响应伊斯兰在 1979 年革命之后的宗教变革，以及 1980 年代之后

>>

的经济改革。绿运动是此一系列响应的延续，也是整个改革运动的一环。

在革命之后，伊斯兰便在伊朗变成了无所不在的结构。这意味着就有的制度都和伊斯兰法律有关，新的伊斯兰制度也被引进，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控制着许多事情。在两伊战争结束后，特别是 Ayatollah Khomeini 于 1988 的死亡，市场经济变成了一支对抗伊斯兰教的力量。这就是在这个意义之下改革运动得以可能的因素，因为改革诉诸多元的社会领域。

Pierre Bourdieu 说过人类对于差异的反应，是建立在自身的秉性（惯习）为基础之上的。有着类似惯习的人、类似资源的人，会有类似的生活，进入类似的氛围。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在 1990 年代伊朗 5 种重要的氛围来自于伊斯兰教和市场经济的重迭之处。(1)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其重要氛围的其中之一就是“后伊斯兰氛围”，因为我认为这个是绿运动背后的主要推手。

后伊斯兰氛围是由都市中产阶级所组成，他们受

过较多教育，使用网络，从事学术工作，艺术、文化、记者、学生等。他们也拒绝传统的论述，拒绝传统的伊斯兰共和国，并且拥抱新事物。若和其他氛围作个对照，这些人都有着高度的全球文化资本。他们会说外语，会到过外旅游等。有人是过去伊斯兰化的支持者，但是现在会反对伊斯兰作为国家的基础。把这个氛围凝聚在一起的是社会多元文化的普片认知，对自由权、民主等事物的要求。

Mohammad Khatami 在 1997 的选举和其支持者在这场改革运动的主要胜利者，可是 Ahmadinejad 赢得了 2005 年的选举，因为他把焦点放在经济和民生问题，诉诸于传统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农村阶级。接下来的几年这些团体因为高失业率和低迷的经济成长而感到挫败，2009 年的情况则更遭。此外，所有的改革成果都开始倒退回去了。

改变的气氛始于 2009 大选之前，受到了大批改革者支持的候选人 Musavi 本有望赢得选举，可是结果造成许多争议。这个反对派势力进入了绿运动。

绿运动也开始碰触政治议题。

后伊斯兰氛围塑造了改革运动。但是这只是早期。后来绿运动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其他社会团体，像是传统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的加入而有转变。因为制度的缺乏和经济的萧条，在加上普遍选举权没有落实，绿运动越来越像是政治反对运动。结果就是这个运动变成了一个伊朗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改变动力来源。■

1. Fadaee, S. (2011)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Iranian Case," in Boike Rehbein (ed.)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in Emerging Societies*.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 挪用历史

伊朗的绿运动

by Abbas Varij Kazemi, New York University, 美国



Photo: shaigan

FARS NEWS AGENCY

2009年伊朗发生了一场不常见的社会运动，称之为“绿运动”。这是个环境抗议行动。主要因为总统大选的争议结果、年轻人对改革的渴望、以及集体对于政治的乐观主义。伊朗人上街要求司法与政治的改革。有些人认为绿运动是宗教运动。虽然宗教语言不是特别的明显，不过运动者创新地挪用宗教论述，在新的脉

络下产生新的意义。这场社运重新定义了诸多的符号与仪式，呼应了 Michel de Certeau (1) 的战略概念，意味着若是国家不允许社运的空间，那么社运会自己找到出路。这个例子中，宗教就是新的场域。

国家的策略和人民当然很不同。在一个神权国家之中，随处可见各种宗教仪式和符号，所以有许多的空间可以操作。因此，

绿运动自创的“Green Friday Prayer”，沿袭了伊斯兰国家男女隔离的规范。

绿运动的宗教性就是“绿伊斯兰”。这是一个新社运的论述基础。Tehran 的中产阶级是发起绿运动的主角。由此看来，伊朗的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和中产阶级有关，更和他们如何协商宗教与政治有关。



绿运动挪用了绿色的历史意含，并且重新政治化了绿色。

> 宁静的抗议

宁静的抗议

2009年6月15日，一场宁静的抗议诞生于德黑兰街道上。在此3个月前，选举文化才铺天盖地地充斥着街道而已。人们开始习惯在街上聚会，免于政治的恐惧，人们高举双手，迎接希望。选举过后的6月15日，宁静抗议诞生了，被视为是绿运动的分水岭。这场抗议吸引了成百上千的支持者，一起游行到 Azadi 广场。这是一场宁静的游行，抗议者的手高举者，不像选前那样的激情，但是坚定地抗议着。这个宁静抗议源自于人民对于政府限制公共集会的不满。不像1979年的革命把 Shah 赶走，绿运动的参加者并没有回归日常生活，让革命或国家主导一切。这些中产阶级抗议者持续地坚持自己的诉求。虽然政府继续镇压，不过抗议者总有新方法可以继续表达不满与诉求。

在伊朗这种威权文化底下，这场运动是怎么发生的？我相信 de Certeau 的战略与

策略的这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这场运动的兴起。在这个解释框架底下，若反抗要在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之下得以可能，那么只有透过不可见的、策略的、隐微的方式去实践。运用 de Certeau 的框架，我将解释绿运动怎么去重新定义其运动目标和角色。

> 重新政治化绿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从这个运动的名称开始着手。在政治动荡的那几个月，特别是总统大选期间，绿这个颜色就代表了抗议与不满。这需要在伊朗的历史脉络下才得以理解：绿这个颜色有着浓厚的文化与宗教根源。此外，绿这个颜色在当时也有很深的宗教意义。什叶派的穆斯林认为绿色是神圣的，和先知默罕穆德与其家庭有关。过去，绿色的神圣本质也代表了抗议，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穆斯林的抗议。历史上，什叶派的文化发展出一种反抗的精神，对抗政治。几个世纪下来，什叶派透过用绿色去表达不满，绿色的仪式用来悼念牺牲

者。从16世纪开始，什叶派变成了主导，则绿色成为了一种伊斯兰中令人害怕的颜色。因此，2009年之前的伊朗，绿色就充满了政治意义。在中产阶级爆发社运之后，绿色从宗教反抗变成了政治反抗的代表。

在2009年总统大选的几个元之前，Tehran 的街道、车子、人们都装扮成绿色。绿色随处可见。即使在网络上，伊朗的部落客用绿色去代表其对运动的支持。这幅景象为都市生活带来一股新意，也看到的政治改革的潜能。绿色没成了 Tehran 中产阶级服装的基本款。这代表了要去改革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此时此刻，绿色是一种抗议，更是一股风潮。

> 翻转旧的口号

绿运动的策略是去挪用过去的1979年伊朗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政权。伊朗革命之后，新的伊朗共和国政府用革命的口号当作官方意识形态。随着时间过去，革命的口号已经被遗忘，政府也不再代表当初革命的精神。可是到了2009年，抗议重新找回了旧口号，赋予新生命。如此也把1979年带了回来。中产阶级用革命的口号去抗议。这样的情绪代表了 Ernst Bloch 所谓的利用过去尚未实现的期望，已达

>>

到未来可无限可能。因此，绿运动重新唤起 1979 年的口号：“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口号后被媒体挂在嘴边挂到都烂了，但是现在被运动者用来挑战这个共和国自己。

虽然运动者个口号是伊斯兰共和国，但是他们要传达新的意思：“革命尚未成功！”被遗忘的政治如今重生，伴随着口号：“Allah o Akbar”、“Ya Hussein, Mir Hussein”。前者在两伊战争变成了军队杀敌时呼喊的口号 (God is great)，后来在 2009 大选时在度政治化。“Ya Hussein, Mir Hossein”则是用来指涉死去的什叶派领导 Hossein Mousavi，他是反对派领袖，也是绿运动的英雄。如此以来，国教的语言被用来反抗国家自身。

> 记忆的政治

绿运动对于空间的不同使用也来自于什叶派的文化。什叶派文化来自于宗教的弱势派别的历史。政府对于宗教领袖 Imam Hussein 于 Karbala 在 Ashura Day (680 A.D.) 的谋杀之后，什叶派采用了这个口号：“每天，每个地方都是 Ashura and Karbala”。什叶穆斯林内化了这个口号，更成为了什叶派的象征。这个传统持续不断地被叙说和记忆。虽然一开始的事件不是什叶的胜利，可是不断地叙事把 Ashura 变成了现代伊朗的仪式一部分。像是早期的什叶穆斯林一样，绿运动的示威者运动国定假日，像是学生节等，以及其他宗教事件，作为机会去组织抗议行动。这个

景象也导致了非官方的节日，像是绿节祈祷等，也都变成了运动者发声的管道。

> 小媒体和政治

“你就是媒体”是一个非常有力度的运动口号。这个口号传达讯息给政府，要政府知道媒体是有力度的，让人们都有机会发生。反对派领袖 Mir Hossein Mousavi 曾经说：“政府一旦把门关上，我们就找窗户；一旦关闭一家报纸，我们就成立新的一家。每一个部落格都被关闭，那我们就成立更多的部落格。”(2)

许多独立报纸和网站的确都被关闭，电子邮件和简讯就因此变成了传递讯息的工具，特别是在人们在街上抗议时。社交媒体网站像是脸书变成了消息来源。抗议者变成了记者，也变成了讯息提供者，利用相机和手机去传达信息与新闻，让抗议变成了实时现场，全球共睹。

> 权力的版图与记忆行动

绿运动从后宗教社会运动那里得到了启事。虽然运动利用宗教人物和宗教语言，不过这些元素并没有受到宗教的限制，反而有了新的意义。我们应该知道，权力结构仍然笼罩着国家，反抗的努力常会被遗忘，特别是空间被国家占据之后。在后选举期间的抗议里面，我们看到抗议活动后来嘎然而止，因为手机被断线，简讯被监

控，绿色被禁止。公共集会也越来越少。选后 6 周，所有抗议符号都不见了，生活回归平日一般。不过同时，地下的涂鸦符号兴起了，延续了抗议的风潮。新的地下反抗文化正在浮现中，人民在此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主人。(3) ■

1.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http://www.irangreen-voice.com/article/2010/apr/18/2594>

3. 谢谢 Ali Sabbagi 和 Halima Adam 对于这篇文章英文版的修改。

> 埃及反革命 暴力

by Mona Abaza,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埃及



Icon Martyr Khaled Said在Alexandria被Mubarak政权的警察杀死。Said的死是2011年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Said被凌虐，也这个图像在许多地方都看得到。Mona Abaza绘图。

很多埃及人一直想知道若是穆斯林兄弟政权的暴力不断上演，那到底要怎么在这个国家活下去。暴力这件事情让很多人开始对于从2011年至今发生的事情有了另一种思考。许多人开始觉得，或许军政

府要必现在这个政权好，因为穆斯林兄弟会政府其实无异于Mubarak政权的腐败。人们开始注意穆斯林法西斯主义，不论在文章、评论，或是电视脱口秀节目上皆可见踪迹。所以欧洲的历史真的值得借镜。

意思是说，不论是军政府或是伊斯兰政府，不论是兄弟会在前、军人在后，即便是两大阵营之间有着妥协、冲突，最终似乎都会引发一场战争，因为穆斯林的极端民族主义已经和军队所掌控的国家利益产生冲突了。军人的政变可能来得比想象中的快。

不管怎样，埃及过去几个月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杀戮、绑架、殴打、死亡以及肿痛的蓄意暴力事件。另一方面，警察完全像是不曾存在一样，弃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放任烧杀掳掠的发生，私刑取代了法律。在贫民窟的人相互残杀，对于歹徒痛殴致死，以及攻击警察局。

这一切让我们重新反思这一切争取公共文化的运动中，身体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公共文化运动是一种不满，不满 Morsi 政府的宵禁政策。宵禁让许多活动被禁止，从人民的日常活动到足球比赛等。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值 3 月初，公民不服从运动如火如荼在 Port Said 城市展开。

从 Morsi 掌权以来，埃及目睹了大量的犯罪暴力事件，包括谋杀、绑架等等。从他上台起，都市赤裸裸的暴力事件发生在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程度之大，已经让人开始开玩笑说 Mubarak 还算是好人，至少比起现在这个暴力政府来说，好多了。当 Morsi 于 8 个月前掌政时，埃及抗议者的死亡人数破百（包括在 Port

Said、Alexandria, Ismailli-yah、Suez、Rafah、Mansura、Mahalla al-Kubra 等城市的冲突，还不包括 Cairo 的 Tahrir Square 和 the Mohammed Mahmud Street II 的 2012 事件，以及总统府的多起抗议）。

(1) 单单从 2013 年 1 月 25 日起至今，Port Said 市就有 53 人死亡。(2)

今天，许多人想问；Mubarak 政权有引起那么多暴力事件吗？我们别忘了在 Alexandria 的 Khaled Said 死亡是如何引发革命的。何况以前有那么多的刑求案例。这些都是革命发生的原因。可是，革命后呢？改变了多少？

有个不同的点在于，我们现在看得到。我们现在正目睹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不断上演，不断侵害人性尊严，而这些暴力正是政府所施加的。这种集体对人性的污辱呈现在人们眼前，透过媒体报导，让更多人知道。或许兄弟会的政府正在报复前政府对他们的暴力，想要掌控整个国家机器，安插自己的人事任命，最后建立一个神权国家。可是，这个政府却是在不断复制同样的论述、方法、过程，无异于前政府，甚至更暴力。

上个月有一场集体抗议事件。若这不是集体反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那么肯定是个反革命运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精神科医师指出在后 Mubarak 时代的精神分裂性格：要求建立伊斯兰的道德国度，可是街道上种种怵目

惊心的暴力事件却层出不穷。这个政权对付年轻运动者毫不手软，不分男女皆以暴力对付。人们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威权所滋养出来的文化，造成了长期以来的暴力文化？

从兄弟会政权开始杀戮手无寸铁的和平时示威者之后，我们见到了公共暴力的一种新形式，那就是造成抗议者之间的恐惧。12 月 5 日意外发生了，为了保护总统，政府军开始公然杀人。(3) 媒体也都很震惊，大家也在电视上看得一清二楚，透过卫星频道可以知道政府怎么杀人的。CBC+2 频道整晚报导这个恐怖的事件，画面一直播放着政府杀人和绑架年轻示威者的影像。大家问道：这个新政府新在哪里？一样，这些暴力早就存在，了无新意。

YouTube 上可以看到很多政府的狙击手是怎么瞄准抗议者的。不仅如此，政府还杀路人、悼念人士等。政府军的粗暴酷刑很明显。300 到 400 人组成的集体强暴组织在 Tahrir 广场强暴了 20 名妇女，目的是恐吓女人不要上街。一连串的绑架、刑求等事件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尸体总是被赤裸地丢弃在街上。这是 Popular Current Party 的 Mohammed al-Guindi 所遭受到的对待，但是政府说他是死于意外车祸。反对派媒体和人权组织指出这就是政府用来恐吓对付他们的方式，要他们永远闭嘴最好。例如集体强暴就是这



革命的开放博物馆，绘制了许多革命先锋图像。这个博物馆在总统府 Heliopolis 前。Tahrir 的博物馆被警察拆掉好几次，没了。Mona Abaza 绘图。

1. Al-Tahrir, February 16, 2013, p. 9.
2. The Egyptian Initiative for Human Rights, February 19, 2013, <http://eipr.org/pressrelease/2013/02/19/1635>
3. Tadros M. "Signs of Islamist Fascism in Egypt?", December 8, 2012. Retrieved February, 14, 2013 (<http://www.opendemocracy.net/5050/mariz-tadros/signs-of-islamist-fascism-in-egypt>).
4. Al-Tahrir, February, 12, 2013.
5. Al-Tahrir, February, 12, 2013.
6. Al-Tahrir, February, 14, 2013.
7. Salem M. "The Horror", Daily News, February 11, 2013, <http://www.dailynewsegypt.com/2013/02/11/the-horror/>
8. Ali N. al-Shuruq, February, 15, 2013.

样。一群人会锁定一个妇女，然后孤立她，扒光她的衣服，凌虐她，用刀子戳其下体。这些 Morsi 都视于无物。相同的暴力一直上演。而政府还责备女人不可以在街上乱晃，要对被强暴负起责任。这样一来其实政府是在将暴力合法化。

在这种极端暴力之下，更有许多 4 月 6 日运动者和 Facebook 的管理者被杀和被恐吓。Mahalla al Kubra 5 的团队也是。当媒体报导在 Torah 和 al-Gabal-al Ahmar 监狱集中营的 114 名小孩时，没看到刑求；(5) 可是当她们的父母找到这些小孩时，全部都被凌虐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识。整个国家知道一个不过在 Tahrir 广场上兜售马铃薯的 12 岁小孩如何被枪杀时，倍感震惊。(6) 他是被军人瞄准射杀的，但是媒体报导是误杀。更没有人报导这个小孩其实是个游民。

许多的观察提醒了我们这

些暴力不是新鲜事。事实上，部落客 Sandmonkey (7) 和 Nelly Ali，两位人类学家研究无家可归的小孩 (8)，都说：埃及正在经历的，无非就是 Mubarak 时代就开始的暴力文化。街上的小孩遭受这种强暴、凌虐、杀戮的对待已经很久了，就跟监狱变成集中营一样，是以前就有的。新的东西是中产阶级开始目睹这些事情，开始觉得恐惧。因为暴力不会发生在他们的家庭身上。过去几个月来我们开始看到许多受难者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这个父权的政府为了延续自身的命脉，就牺牲青春的肉体来献祭。■

> 印度大学成为 营利机器

by Satendra Kumar,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Delhi, 印度



在Uttar Pradesh贩卖学历的广告。

(CCSU) 是以农民领袖以及前总理为名，在 1966 年设立。该大学提供硕士、博士预备、博士学位。此外，大约 55 个学院设立于该校。虽然班级人数很多，基础设施不足，导致教育质量低落，可是还是提供了很多人的学习机会。但是这一切到了 2000 年之后完全不同了。采取了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政策路线之后，预算不断缩减，停止得到补助，没钱开设课程，系所和学院的经费也都短缺，无法开课。(1)

该校要私人机构来经营大学的决定导致了企业公司决定了课程。然后这样举动也吸引了失业、失学的青年，某些人有在经营训练课程。此外也吸引了政治人物。一夕之间，教室变成了职业训练所。上千上万公顷的公有地被分配给政治人物，这些人想要藉此洗钱，并从中抽税获利。(2)10 年之内，超过 350 间私人学校成立，如雨后春笋。CCSU 给了需多工程、管理、药物、等其他的大大学学位。很明显地，没有学校要给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的学位。这样的结果使得 CCSU 从公立大学变成了私人的营利机构。

国家解散公立大学以及富人阶级的兴学，造成了许多不平等的结果，特别是在教育和社会正义上。一开始，许多的

全 世界的大学都面临商品化和管制的双重压力，印度的大学也不能幸免。在 1990 年早期，在全球化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印度政府宣布高等教育应该提高收费，以增加资源，并且鼓励私人捐献，透过私人咨询等管道去开源。2000 年 4 月，总理贸易和工业部任命了由 Mukesh Ambani 和 Kumarmangalam Birla 所领导的团队去进行了改革措施。这个团队认为教育是营利事业，并且建议政府只能管制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应该由私人负责。接下来，高等教育的预算减少，新的人员也停止雇用。下面我会讨论这个商品化如何导致了在 Meerut 和 Uttar Pradesh 的公共大学如何私有化。

Chaudhary Charan Singh University

>>

学院成立毫无章法，没有政府的允许。这使得很多学生没有好的基础设施和老师。今天你仍然可以发现学生只有注册的时候看到一张纸，其他什么都没有。有些学院钻法律漏洞，收穷人高额的非正规学费。(3)

为了要帮助贫穷和下层阶级，奖学金被通常被发给那些卡司特学生 (Scheduled Caste) 去上职业课程。但是这并没有帮助到社会正义，反而让私人学校有营利的机会。许多私人学院和机构雇用咨询顾问去得到这份卡司特学生的名单，挨家挨户去调查。然后这些学生被要求去这些私人学校的职业训练，藉此学校可以得到补助。许多案例都是学生并不对课程感兴趣，可是被迫注册。此外，与多学生也上两种以上的课程，但都没有背景知识。前者，学生不用上课就可以毕业；后者，学生什么也得不到。不过两者学要都可以获利，因为可以获得政府补助。

私人学院也变成选举机器。许多政治人物成立职业学院为的是政治利益。在农村和郊区成立，是为了收买便宜的农地。这些政客把自己塑造成慈善家，帮助贫穷人口，也帮助更多人，营造这种行性。这些私人学校已经变成地方选举动员网络的一部分。那些穷人负不起规费，也无法上学，所以容易被收买。选取期间这些人就帮忙竞选。

事实上，政治资源已经被用来扩张私人部门了。私有化不但开创了富人阶级，拥有学校，提供教育给富人，还恶化了暨有的不平等，包括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很大一部份私人学校的毕业生要继续学习以增强专业技能，也得不到高薪的工作。穷学生发现他们其实落入了

圈套之中。因此，结果就是这个阶层体系的再生产，以及知识的工具化。我研究 Meerut 和 Western Uttar Pradesh 的这个现象，希望可以还有其他印度区域的研究可以比较，看看买票、贿选、贪污的情况。我想这和全世界的潮流相似，公共财正不断被私有化，并被国家和资本家联手推动。■

1 自己缴费的课程是要求学生负更多的钱去支撑一个课程的开设，学校负责提供场地、建筑物老师、图书馆等。总之，政府用公共的钱去资助私人学校。

2 经营教育机构是一种社会服务，被认为是非营利且免税的。

3 非正规学费是非正式的。在印度这是必要的。

> 德国社会学家抗议

学术排名

by Klaus Dörre, Stephan Lessenich, Ingo Singe,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德国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的硕士生 Johanna Sittel在Jena和许多其他人一起抗议学术排名制度。

全球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正在历经结构性的转变，这项转变是由那些私人大学所带领的。整个原则就是新公共管理，也就是说，大学变得越来越像私人企业。资源的分配要按照学术绩效，学术资本主义也因此进入德国，透过评鉴排名控制大学体系。学术的缩编也都由量化指标所主导，包括了经费、人员数量等，完全忽视质化的面向。在学术圈工作的模式和内容都变得不一样了，教学与研究越来越要配合管理责任。这里有个内在绩效评量的逻辑在，就是“多还要更多，永远不嫌少”，导致工压力生工，负荷过重，导致了反效果。

德国社会学会 (GSA) 已经决定要反对这个学术资本主义，抗议2013 CHE 排名 (高教发展中心)。这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排名系统，指针包括了教学研究成效，教授声望，科学基础设施，以及国际能见度。为此，透过访问系所学生，老

>>

师等，由第三方进行评鉴。评鉴结果会公布到 Die Zeit 杂志上，所以对于高等教育相关人员来说可谓事关重大。

GSA 最近要求系所讲师、学生不要参加这个评鉴。一开始是由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的社会系发起。该系被评鉴为最好的师资队伍，其教师利用这个名声抵制评鉴。声明在 2011 评鉴结果出炉后发出：

发表在 Die Zeit 的 2011/12 CHE 评鉴排名将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的社会系排名在前。我们对于这项肯定相当高兴。可是，我们质疑这个学术排名本身的正当性。我们认为这个排名的数据并不完整。而且大学排名会导致学术生态的竞争化，产生赢家和输家，对于知识生产并无帮助。所以社会系决定不参与下一次的评鉴。我们会和 GSA 合作去找出更好的方式。同时我们呼吁应该要有更合理的学术判断方式，以及更好的信息提供给学生。

这个抗议受到媒体大幅的报导，同时受到 GSA 和德国多数社会系的响应。历史、英文文学、化学、教育、政治系也决定不要接受 CHE 评鉴。

这项举动并不被学校管理阶层所支持。GSA 也说评鉴的原则还是适用。只是 GSA 的理事会在 2012 年 10 月决定要建立另一个给学生的信息系统，并且成立一个工作小组“Task Force Studiengangsevaluation”去讨论替代方法，使得评鉴更具有效度。抗议将会在 2013 年夏天进入高峰期，届时我们会看到这个抗议是否会被学生和学者所支持。现在结果还未知。但是 Jena 的社会学家，以其全德国的社会学家，都希望全球可以一起加入这项抗议！

更多信息请到：www.soziologie.de/che ■

> 可绑架性

墨西哥都市暴力的常态化

Ana Villarre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



Ana Villarreal在Facebook上的绘图。他是一名31岁的公司负责人，在2012年于办公室被绑架。虽然其家人付了很多赎金，可是还是被撕票，尸体被丢在公路上。这个案件让许多人重新把办公室迁到很远的地方，在家附近或是家里。

23

Carolina 带她 7 岁的小孩去看 Rapunzel 电影，但是从此后悔莫及。几个月下来，Mariana 一直恐惧有人会爬进窗户绑架她。“我感觉总有坏人在那边。”她告诉妈妈。这段对话是我在访谈她时说的。她边喝着咖啡，边坐在一个高级的阳台上。“你说得对，但是妳也不用成天一直担心这个。”妈妈说，“第一，这不是城堡；第二，你没有魔法；第三，我都跟妳睡在一起，不像她们卡通中的人都分开很远。”该电影让小朋友们有很多恐惧的想象。“Fuck 迪斯尼！”Carolina 生气的说：“为什么他们要拍这种绑架的电影？”

电影引起了许多墨西哥

>>

人当今的害怕：害怕被绑架。绑架曾经是上层阶级的例外经验，但现在却不再是例外。Monterrey 拥有 4.5 百万的人口，曾经被誉为是企业家都市，如今却是毒品、暴力新闻的头条所在地。被吊起的尸体悬挂在高速公路上，这福景象让全世界怵目惊心。可是暴力每天都在恶化，其他的犯案也在急速增加中。

最近的一项墨西哥智库研究指出，绑架是犯罪行为中影响人们最大的，被认为最不安全，比杀人或组织犯罪更高 (CIDAC, 2012)。官方犯罪统计资料很不可信，因为被害者和其家庭不太可能报警，因为对警方和司法的不信任。然而，比较可信的资料指出绑架率可是一直在升高中，在 Nuevo León (Monterrey 所在州) 更是如此。这里我想要检视为什么墨西哥都市的绑架如何常态化。我利用的是我正在进行的田野，说明绑架如何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实做里面。

你知道暴力越来越常态化，特别是进入了日常语言和生活之后。语言来说，过去两个月我开始听到新的词汇被发明出来描述这种暴力现象。至少在中上阶级中是如此。人们开始讨论他们是否具有“可绑架性”。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 2013 年

1 月 25 日从一个 43 岁的中上阶级女性口中得知。她叫 Lucia，决定要放下一切恐惧，到市郊的别墅去。她们的别墅有很大的游泳池，环绕棕榈树，是个两层楼的别墅。但是因为该区治安很糟，她们一直不敢去。“我的家人劝我别去，因为我具有可绑架性。”我有一次到过那边，享受阳光并喝酒。可是她说：“虽说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武力劫持，可是在那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在那边会被孤立，会被绑架，因为你具有可绑架性。”

第二次我听到这个词是从 Santiago 口中。他是一个 28 岁的年轻人，住在中产阶级区域。我们的访谈在 2013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他说：“我知道我不具有可绑架性，我的收入大约每月 17,000 pesos，所以一个人来说很够用，可是要怎么存钱？若是我的收入为 100 或是 200,000，那我则具有可绑架性。我的车子是 2002 Cacalier。”关于车子这点很重要。许多 Monterrey 的居民已经把车子变成分散的生活方式。有人把一台 BMW 卖给 Satiago 的朋友，因此让他很担忧。这位朋友坚持没差，因为是一辆老车，可是 Satiago 告诉他绑架者才不管车子新旧。所以，可绑架和避免可绑

架是这些人关心的事情。

在这个卖落下，暴力的常态化从动词 secuestrar (绑架) 变成了形容词。高绑架率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分类，连结到犯罪，并且把人口分裂成两群：那些自认属于危险族群的，和那些不这么认为的。可绑架性，在这个卖落下，成为了特征，可以从其他行为中去预测，像是消费模式、行程、工作、交通方式等。

“他们不必要去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Carolina 在访问结尾时补上这句话。“我还是想要去保护她们，保留这个天地，保留童年。”Carolina 说她不认为她是可绑架的，但她也小心不要离开这个比较富裕的居住区域，也从此不再戴 Cartier 的手表，或是开敞篷车。她也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她鲜少晚上出门，而且把社交圈限于她的朋友、学校、家庭。她很小心翼翼地建构这个小天地给 Mariana，也试着保护自己。可是，访谈的最后，她随口说：“我想知道人们是怎么活在战争区域中的？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怎么化解焦虑？想必很可怕！”

References

CIDAC (2012) 8 Delitos Primero. Índice Delictivo. Centro Integral para el Desarrollo, A.C.

> 墨西哥青年的 社會分化

by Gonzalo A. Saraví,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Higher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CIESAS), 墨西哥

墨西哥的不平等蔓延全国。在平庸的经济成长和其他社会指标的停滞之后，墨西哥的不平等恶化许多。即使教育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扩张，现金转账的系统，像是 Oportunidades 普遍可见，但是这些对抗贫穷的制度并不怎么有效。

然而，在许多国际性进步指标的达成底下，不平等持续恶化。在这种反差现象之外，一种新的称之为“不平等纳入”的现象出现了。特权和剥削随处可见，彼此忽视却又默许之。不平等造成了一种质性的跳跃：社会结构的分裂不但是种不平等，还是社会与文化的相互排斥。

这个分裂过程在成人化之中特别明显。小孩和青年是人生中的重要阶段。而这个阶段的机

会与限制是往后未来发展的关键。此外，这个阶段更是社会化和主体化的重要环节，决定了人生后来属于什么样的社会或文化范畴。这个主题的研究文献累积了一定的成果，可是对于不平等如何造成社会分裂的议题来说，还是很少人碰触。成人化和青少年经验是探讨社会分裂的理想指针，在结构或是文化上皆是如此。

墨西哥的教育机会从过去几十年来成长很多。在 1990 和 2010 之间，基础教育（9 岁）已经相当普及，25-29 岁的人平均教育年龄从 7.9 增加为 10.2。此外，宪法改革也延伸了义务教育年限，2011 年成为 12 岁。可是教育系统也因此分化。特权阶级的小孩都去念私人学校，享有更多资源。而下层阶级的小孩到同构型很

高的公立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比较不好，资源也较少。结果就是造成教育成就的分化。在一项 2006 PISA 的科学测验中，只有 25% 的前 1/4 社经地位的学生没通过，可是第二个 1/4 社经地位的小孩有 56% 没通过，后两个 1/4 社经阶级的学生则有 71% 没通过，可谓相当悬殊。

分化的结果不只限于教育成就上。分化延伸到学校经验和教育的意义之中。对于上层阶级的小孩来说，学校是一种封闭的场域。其生活很大一部分跟学校有关，是社会化、认同、社会资本形成重要部份。其社会网络的同构型延伸到其他场域，从小到成人皆是如此。学校是成人化的唯一管道，教育路径非常线性单一。同时，下层阶级的小孩和年轻人则完全

不同。他们所接触到的影响比较多元。因此，对这些人来说，教育是过度的阶段，学校随着年纪增长也越来越不重要。

教育的分化也和都市分化有关。墨西哥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其都市有着严重的居住隔离现象。例如，像是贫穷的边缘人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边缘化。有钱人集中在某个特殊区域，与世隔绝。这种区隔和孤立是精英的特权。他们害怕都市的危险，这种害怕也扩散到中产阶级或是更低的阶级，成为他们向上流动的动力来源。

社会空间的分化程度是超出居住隔离，并且进入了小孩和青少年的社会生活之中。居住、学校、购物、娱乐等，这些都是社会空间的运作模式，决定了一个人的都市经验。空间在此表示着社会关系。这个社会过程创造出了一种特别且不平等的空间结构：贫穷和富有的年轻人彼此互斥，不管在地

理上或是在经验上皆是如此。

他们对于正常都生活的定义是镶嵌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之中的。举凡交通、居住、街道、绿化空间，甚至行动、穿着、讲话方式等，都大不相同。这不仅代表了不同，也代表了不平等，更代表了空间的相互排斥。

即使当隔离的程度减少时，都市生活也因为大家都避免接触他者。享有特权的年轻人因此从公共领域撤退，自我隔离开来。有钱人读私人大学，在高级的购物中心和饭店，有私人轿车代步。我所访问的20名私校学生中，只有3个人没有车子，而其他19个公立大学生中，没有任何一人有车子。后者更有90%是用大众运输系统，一周超过3天以上。相反地，私校学生只有15%有这种经验。

精英没有从公共领域退守的豁免权。新型的半公共领域浮现了。这种半公共领域和各种私人

安全连结在一起，成为阶级的界线。但是开放的公共领域被大多数人所占据，社会互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此外，城市之外的年轻人多数待在废弃和禁止的空间中。和陌生人的互动不可避免，但是却被污名化，或者被限制在某个社会阶级里面。

如此的社会分化有两个意义。第一，这是在社会指标背后的一个机会因素得以让不平等纳入更恶化，并获得社会支持。第二，这样的社会排斥与文化空间的分化会使得集体责任弱化，也会使得他者的认知与了解弱化。总之，社会分裂恶化了不平等，也瓦解了社会连带。■

> 当代日本的不平等

by Sawako Shirahas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member of the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2014 ISA World Congress, 横滨, 日本



哈佛社会学家和东亚专家Ezra Vogel的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published in 1979, 成为

战后的日本，社会不平等当激烈的辩论可谓相当激烈，所以阶级和日本特殊性的模糊界线交织在一起。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而战后的1950年代快速的经济成长转变了日本工业，使得日本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社会学家Ezra Vogel (1976)的著作：Japan as Number One就称赞了日本的制度，广受日本读者的欢迎，因为这本书激发了日本人的优越感。在经济方面，日本是可以昂首阔步，可是国家因素的讨论却有点太过自满。那些日本特殊性的言论总是有这样类似的因果论证：因为日本，所以经济那么成功。这位免过于夸大。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全日本都是“中产阶级”的言论俨然是流行标语。虽然成长或有缓慢些，可是平均所得都在上升，多

数人都买得起房子和车子。在一个1976年所得分布的研究中，OECD发现日本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Sawyer, 1976)。这个变成了后来的“日本例外论”之根据。也是所谓日本整个社会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论证核心。但是到了1980和1990年代，许多人开始对此产生怀疑了。

日本在1990的泡沫经济后进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失业率攀升，特别是50到60岁的人口最严重。他们多数是高中学历。而数字从1990年代的6.6飙高到2002年的12.8。更重要的是，传统日本的劳动是终身保障，但后来就取消了。其中一个主要推力是50和60年代的经济条件让公司可以马上训练刚毕业的高中生，马上可以提供他们稳定的收入保障。终身职的系统提供了劳工一个有保障的未来，让他们可以规划人生。可是现在情况完全相反。几乎一半的劳工都是非典型雇佣，根本无法经济独立。

此外，年轻人认为经济没有保障前不愿结婚，因为没钱可以养家活口。然而，年轻女性宣称他们生了小孩之后会被家庭绑住。很明显地，性别不平等深深镶嵌在家庭里面，是当代日本不平等的一项重要

因素。家庭是日本社会制度很重要的一环，也是提供安全很重要的角色。拥有家庭可以减少经济负担。事实上的确，单亲妈妈和独居的妇女在经济上相当边缘。

性别和世代是结构日本不平等的两大因素。不过，相关的研究很少。如此的研究其对于检视各项日本公共议题来说相当重要。的确，我们可以说，全球工业社会的问题都该被放在不平等的框架下来讨论，这个框架可以看出各个国家之间的异同。■

References

- Sawyer, M. (1976) "Income Distribution in OECD Countries"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 Vogel, E. (1979) Japan as Number O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俳句

简单的美

by Koichi Hasegawa, Tohoku University, Sendai, and Chair of the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ISA 2014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横滨, 日本



在Higashine市的松尾芭蕉雕像。Koichi Hasegawa摄影。

“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原本是传统日本文化，而现在则在其他语言文化中都可见其身影。传统的俳句只有少于17个音节，分布于3行中，依序5-7-5个音节，要求要有一个字代表该年的季节。不过后两者只有在俳句的写作中应用。俳句的历史远溯于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他同时也是旅行家。从那时起俳句就变成了日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主要的报纸每天刊登俳句，并解释其中意义。每周也选出读者投稿的俳句，通常要从40-50个中选出一首，有4-5个评审，可谓相当竞争。俳句诗人也在周末会聚首讨论，相互分享，切磋技艺。日本至今已经有上百万首俳句，爱好者更不计可数。

俳句的本质就是简单。这个原则同样被日本禅宗所秉持，其他像是茶道，日本料理等也是。简单，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也象征日本的美。传统日本艺术作品通常会大量

留白，没有太多颜色、线条。这样是邀请观赏者一起进入作品去诠释与对话。俳句的精神也是如此，只着重在其中的 1-2 个字。细致的弦外之音就由读者去体会与猜想。总之，俳句体现了简单之美。

社会学的朋友们，让我介绍最有名松尾芭蕉的俳句。松尾芭蕉是 17 世纪俳句的创始人。一位日本文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退休教授 Donald Keen 把其中一首俳句翻译成英文：

The summer grasses -----
Of brave soldier' s dreams
The aftermath.

这首俳句是松尾芭蕉作。那时他到 Hiraizumi，也是现在日本的 Iwate Prefecture。当时那是一个 12 世纪著名的战场。每年夏天，杂草丛生于此地。可是，这个地方代表了自然永恒的力量与循环。此外，战士最期待的就是梦想与希望。所以从这短短三行内，松尾芭蕉生动地对比了自然的永恒和政权的短暂。我们也看到俳句充分利用了隐喻、对比、象征等技巧。不过也要运用得当。总之，严谨又自然地修辞是俳句最重要的特色。

自然对日本人来说相当重要。季节分明的日本让人们非常珍惜季节的意义与交替。举例来说，你们知道有多少种表达“雨”的方式吗？一般日本的字典有 160 种关于雨的字，像是“软雨”、“花雨滴”等，代表花开前的降雨。日本文化有各种精致对雨的表达。如此深刻的文化特色吸引了全世界的俳句

迷们。我是个俳句迷，每个月会写 10 到 12 手俳句。我除了是社会学家，也是俳句诗人，出版了我自己的俳句集，叫做 Ryoku-U (在绿色季节的雨)。而作为环境社会学家，受到环境挑战、事件、议题、灾害等的启发，而创作俳句就像是对社会、自然、人生的瞬间捕捉。我愿意用松尾芭蕉得另一首俳句当作本文的结尾：

Have the rains of spring
Spared you from their onslaught,
Shining hall of Gold?

Hiraizumi 现在是 UNESCO (<http://whc.unesco.org/en/list/1277>) 的世界文化遗址，也是松尾巴创作“的夏日的草”的地方。此处距离横滨只要三小时车程。俳句和社会学有许多相日之处：分析、批判、纪录社会与自然的生活。■

> Bilbao的执行委员会会议

by 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SA会长



Bilbao的执行委员会会议。

ISA 执行委员会的年度会议在 Bilbao 举行，为期 5 天。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很热心地提供场地，并且执委 Benjamín Tejerina 教授和其社会系的同事相当帮忙。其中 2 天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是“危机之外：社会学面对新的风险、不确定、危险”，由许多委员和其他的学者参与。

为期 5 天的马拉松会议由各个计划委员会分别讨论在 2014 年的世界大会筹备事宜，由出版副会长 Raquel Sosa Elizaga、计划副会长 Jennifer Platt、财务副会长 Robert Van Krieken、研究副会长 Margaret Abraham、以及国家学会副会长 Tina Uys 等人共同主持。

另外，大家也共同讨论，为期 2 天。过去这一年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事情。包括在台湾（台北）的博士生 Lab、Buenos Aires 的 ISA 论坛等，为 2014 世界大会立下很好的基础。我则报告了到各个国家去联系串连组成 ISA 数字化的工作

（包括 Global Dialogue, Universities in Crisis, Public Sociology Live, Journeys through Sociology 和发展中的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执行委员会也确定了 2018 年的世界大会将由 Toronto 举办。另外 2016 年的大会仍在讨论中，有 3 个城市候选，分别为 Budapest、Copenhagen、Vienna。我们最后小名单是 Budapest 和 Vienna。之后会做最终决定。

其他事项还包括：

讨论重组 ISA 行政架构，使得各计划委员会可以更佳利用执委会。这个新的委员会由会长负责，由各副会长组成。目前大家正再在线投票。

1. 建立一个机制可以让 ISA 可以公开为受到人权迫害的社会学家发声。
2. 建立一个让不便者可以参加会议的友善环境。
3. 建立一个对外募款的委员会。

4. 建立一个新的奖项: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 Margaret Abraham, 研究副会长

研究协调委员会 (RCC) 在此次会议收获颇丰。我报告的第二次 ISA 论坛 (Buenos Aires, July 31-August 4, 2012) 的成功结果。有来自 84 个国家, 3592 个人注册参与, 超过 650 个场次。社会正义与民主化会议成功落幕, 我们正筹划下一次。

各个学会也讨论的规章, 而主题工作小组们也审视修改了规章, 把 RC 规定要在下次选举前完成这些工作。RCC 也检讨了 2011 和 2012 的奖助分配, 讨论 2013 年的分配。RC37 (Sociology of Arts) 的奖助案通过了。主题小组 05 (Visual Sociology) 的升级要求也通过。新的主题小组是社会工作, 不过经过仔细讨论后, 因为重复, 所以不成立。

RCC 也讨论的横滨 2014 世界大会的相关事项, 包括:

1. 升级在线系统, 并从论坛得到经验, 由 RC 协调。
2. 10 个的大会整合提案做出选择。
3. 提升奖助的使用, 并透过各个小组提供注册的协助。
4. 训练新的小组人员参加研究委员会的议程。

我也很高兴告诉大家 ISA 的财务委员会允诺给予额外 10000 欧元的经费去支持注册费。

> Raquel Sosa Elízaga, 计划副会长

过去 3 年来, 计划委员会在 3 次的年度执委会会议中讨论了许多议题, 参加成员包括了 Michael Burawoy (ISA 会长)、Margaret Abraham (研究副会长)、Tina Uys (国家会会副会长)、Elena Zdravomyslova、Benjamín Tejerina、Sari Hanafi、伊庆春、我 (计划副会长)。Koichi Hasegawa 则以日本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身份参与。此外, 还有其他许多杰出学者, 包括了社会不平等的专家们,

接受了我们邀请成为永久出席委员: Edgardo Lander、Göran Therborn、Kalpana Kannabiran、Markus Schulz、J. Esteban Castro、Boaventura de Souza Santos (无法参与会议)。这些学者带来了高质量的讨论与辩论。此外, 彼此的合作也让我们开始准备 Facing Inequality。这会在在线出版, 也会成为我们的基本论述, 去架构一个可以观照所有不平等问题的框架。这个努力很重要, 因为这关系着全球学术合作与贡献。结果会由我们委员会发表。

委员会也讨论了会议场次的长度要如何对于世界大会有所贡献。主题的多元性让我们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 加深我们的合作。这些包括了 Integrative、National Associations、Ad Hoc 等场次, 也有作者面对读者的规划。在地委员会和会长的额外场次已经通过。世界大会的主办将是联合国要求要达成千禧年发展目标的其中一项。我们衷心期盼可以了解全球不平等以及找出应对之道。

>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会长

出版的部份运作相当顺利, 有许多新的进展和改变。

第一期 Current Sociology 和 Sociopedia 合作, 于今年底会发行。内容将会包括各种主题, 例如社会冲突、灾难、健康、疾病等等, 这些目前只有在 Sociopedia 上可以看到, 所以将来会有更广泛的读者阅读到。第二期的征稿即将开始。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 也接受各种回顾对象, 像是电影这种非传统的书。eSymposium 则在搬家, 它会在我们社会正义与民主化的网站 <http://sjd-space.sagepub.com/> 上看到, 只有会员可以阅读, 下一期才会开放。Vineeta Sinha 是现在的主编, 成为了网站的负责人, 下一位将是 Kelvin Low。

为了帮助我们响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也为了国际社会学会的社群, 一份在线的调查会问各位关于 Current Sociology 和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的意见。结果将在世界大会上讨论。

我们出版的书: Sage Studies in Interna-

>>

tional Sociology 有一个相当有创意的收费方式。图书馆的纸本还是会继续印刷，但是低价的纸本将会提供给 ISA 会员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第一本这样的书会是 Key Texts in World Sociology。

许多国家对于开放使用期刊的情形有来自许多资源的支持，所以也需要新的法规去处理这整个事宜。只要作者同意，然后付一些费用，那么这篇文章就马上开放。而对于那些认为一年后才可以开放的，那么就不用付任何费用。

> Tina Uys, 国家学会副会长

国家会学的协调委员会在 2012 年有许多进展。最重要的是在 2013 年 5 月 13-16 日于土耳其 Ankara 的国家学会会议。场 替 由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METU) 所提供。这次会议主题是“动荡年代的社会学：比较方法”。这场会议将会由将近 40 个国家和 70 个代表出席。我们再次要特地感谢土耳其在地的筹办委员会，以及 Doctor Ayse Saktanber 的负责，他是 METU 的社会系系主任，很热心负责筹划了整个会议。

沙乌地社会学会和社会工作学会申请加入集体会员，再讨论规章之后通过了。现在 ISA 有 57 个集体会员。我们也检讨了申请程序，不过这部份的结论要等到下一次的国家学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年度会议才可以决定。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学会、伊伯利亚半岛社会学会、比利时社会学会、莫桑比克社会学会报导了区域会议的相关事情。这些会议由 ISA 赞助，而且在讨论后通过。

网站升级的资金已经给予 Argentinian Consejo de Profesionales en Sociología、和阿根廷、澳洲、科罗埃西亚、德国、伊朗等国的社会学会。Finnish Westermarck Society 得到了办理区域博士工作坊的奖助，主要参与者是北欧国家。NALC 在申请时强调了区域的重要性。

> Robert van Krieken, 财务副会长 会员

本委员会检视了集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情况。在 2012 年 12 月达到最多人：5300 人次。

研究、工作、主题委员会的会员情况也是讨论的项目，包括了有 4 个研究委员会的会员数目减少，以及有许多快速成长的委员会：RC07 Futures Research, RC09 Social Transformations &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RC13 Sociology of Leisure, RC19 Sociology of Poverty, Social Welfare & Social Policy, RC21 Regional & Urban Development, RC31 Sociology of Migration, RC32 Women in Society, TG03 Human Rights & Global Justice, TG04 Sociology of Risk & Uncertainty, and TG05 Visual Sociology。

有些人关心终身会员比例增多的现象，以及询问执行委员看法。Ishwar Modi 和 Tom Dwyer 的委员会分析了会员数量，并建议了许多关于增加会员的事项，包括了成立次级委员会去负责会员这块。

财务

委员会指出会员费有稍为降低的趋势，其他项是期刊的专利费、利率等也有。而各项 ISA 的运作支出也有点增加。不过 Sage 部份的收入增加很多。

2011-2012 的财务报告放在 ISA 的网站上。

其他资金的申请结果由执行委员会做最后的决定，包括了国家会员参与横滨大会的额外补助，以及横滨大会的计划委员会议。这都属于世界大会的预算项目。■

> 介绍波兰团队

公共社会学研究室

by Karolina Mikołajewska, University of Warsaw and Kozminski University, 波兰

学生组织“公共社会学研究室”于2011年正式成立(波兰文: Kołło Naukowe Socjologii Publicznej), 隶属于 University of Warsaw 的社会学研究所。我们是一群大学生和研究生, 共同有着类似的兴趣, 以 C. Wright Mills 的话来说, 就是关心公共议题和个人关怀之间的连结。我们致力探索这类议题。

我们也从事各种学术行动,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翻译全球对话的波兰版本。在第 2.4 期中我们也有一篇文章叙述 Sztompka 和 Burawoy 之间的辩论, 这和波兰学术问题息息相关。该文也是相关讨论的其中之一。这个辩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除此之外, 我们也举行各项研讨会。目前正在筹划组织一个波兰社会学学生组织。总之能够加入全球对话的大团队, 是一件令人再兴奋不过的事了。相信这会有助于将公共社会学的影响力带到波兰之外。

public.sociology.kn@uw.edu.pl



Adam Müller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会学院硕士, 现在是博士候选人。兴趣是合作银行与道德经济。



Karolina Mikołajewska

University of Warsaw 硕士, 现在是博士候选人。Center for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s and Workplaces (Kozminski University) 的教学与研究助理。兴趣是经济人类学, 社会学, 劳动关系, 组织研究。



Krzysztof Gubański

就读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会系和文化研究系。Ludwig 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unich) 就读一年。兴趣是经济社会学、都市研究、论述分析。同时是学生组织的活跃成员。现在撰写波兰高等教育为



Mikołaj Mierzejewski

就读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会系。兴趣是高等教育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阶级分析、公共社会学。是 New 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的成员, 负责研究该组织, 聚焦在学术的变迁上。



Jakub Rozenbaum

University of Warsaw 社会学研究生。以私有产权在共党之后的复苏为题撰写论文。兴趣主要是劳动关系、公民(特别是青年)参与, 住屋问题。大力支持社会学界入社会变迁。



Anna Piekutowska

University of Warsaw社会学研究生。兴趣是社会运动、社会经济、性别社会学、性。之前研究包括女性主义组织对于波兰女性的影响。硕士论文是社会合作作为社会包容的方法。



Tomasz Piatek

University of Warsaw 的 Robert B. Zajonc Institute for Social Studies 博士生。主要领域是教育社会学, 青年研究、批判教育、社会学家的社会责



Julia Legat

University of Warsaw毕业, 现在是在社会学研究生。主要兴趣是社会运动, 公民参与, 社会不平等。



Zofia Włodarczyk

University of Warsaw社会学研究生。正在撰写关于乡村女性自传的能动性论文。主要领域是公共社会学、公民参与(特别是青年和乡村地区), 传记社会学。



Emilia Hudzińska

University of Warsaw国际关系研究生。现在兴趣是美国研究和去殖民。曾经毕业于该校社会系硕士。现在的论文关于波兰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

> 加拿大社会学 敞开双臂欢迎各

by Patrizia Albanese, 加拿大社会学候任会长; 2018世界大会在地委员会主席, Ryerson University, Toronto, 加拿大



Toronto 的社会学者和 Michael Burawoy 和 Izabela Barlinska 见面, 讨论 2018 世界大会。上排左到右: Lorne Tepperman (University of Toronto)、Cheryl Teelucksingh (Ryerson University)、Izabela Barlinska (ISA Executive Secretary)、Bob Andersen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下排左到右: Nancy Mandell (York University)、Patrizia Albanese (Ryerson University)、Lesley Wood (York University)。

加拿大社会学很高兴跟各会宣布一个好消息: Toronto 被选为 2018 年 ISA 世界大会的举办地点! 我们希望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加拿大社会学虽有独到之处, 但也相当友善, 并且也具有批判与反身的活力。所以, 在此就让我们作个自我介绍一下吧!

相对于说明加拿大社会学是什么, 我们比较容易去说明加拿大社会学不是什么。所以, 加拿大社会学不无聊、不死板、不铁板一块、也不容易用三言两语说尽。

社会学向来就对外开放, 与不同学科间彼此交集。所以我们是多元的专

业, 不怕向外延伸触角, 集思广益, 也不怕逾越规范。我们聚焦在社会上, 来来回回思索问题。我们更不停质疑, 甚至质疑我们自己。过去多年来, 加拿大社会学已经不断审问自己: 我们是谁, 我们作些什么,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作这些事情。像是 Robert Brym (2003)、Neil McLaughlin (2005)、Doug Baer (2005) 等人已经辩论过加拿大社会学是不是处于危机之中的议题了。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一个学科健康的象征。Mark Twain 说过: “对我死亡的报导是言过其实了!”

加拿大社会学生气蓬勃、欣欣向荣。加拿大社会学会的组织不断成长, 期刊也很有活力。Reza Nakhaie (University of Windsor) 是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CRS) 的主编, 也是最资深的审稿人, 他最近发表了一篇过去 45 年来该期刊的历史回顾。他说: “CRS 发表的文章对于建立社会学者之间的对话相当有帮助, 对于其他知识分子也是! CRS 代表了加拿大主流社会科学的声言, 也扮演着批判反对的力量。所以, CRS 是一份提供加拿大社会学者彼此之间批判对话的平台, 也是学术累积的期刊。”

我们所希望的是我们这个学科会一直仅仅贴近社会脉动。社会学一旦脱离社会, 那么恐怕也气数将尽。有一项针对 54 个加拿大使用英语之社会系的研究指出, 批判的思考, 博雅教育的基础, 将对大学社会系有深远的影响 (Puddephatt and Nelsen, 2010: 423)。若我们可以达成部份的目标, 并且为大学生甚至

研究生多作些努力，那么这个学科的价值更是表露无遗。

让我简单作个结尾。我要分享一些加拿大社会学家的观点。我们邀请了学者表达他们心目中对加拿大社会学得看法，整理如下：

加拿大社会学在许多方面都很特殊，包括语言、宗教、教育、理论取径、经验研究等。若其中有任何共识的话，那就是去整合美国和欧洲的传统，重视历史，多元方法，并且致力批判。其首先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传统，然后马克思的新政治经济学，到最近的去殖民、女性主义、后现代、以及浮现观点。较不被重视的是古典理论，这应该世家拿大社会学的健康指标。(Dr. Howard Ramos, 副教授，社会与人类学系，Dalhousie University)

在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的研究生讨论课里面曾经讨论过这个，让我贴出来分享：“加拿大相异的人口组成，加上多变的自然与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学来说是个挑战。加拿大社会学有能力去了解这个异质性高的社会，并且批判性地指出常识性观点下的真实运作。”

Dr. Nancy Mandell 是 York University 社会系主任。这是加拿大的大系之一。她有如下的看法：“我们所传承到的优势，来自于 1960 年代的批判社会学和其应用，让学生得以介入社会。我们系主要是批判地去挑战传统预设和追求社会正义，像是平等健康、性别自由、司法责任等。广泛说来就是关心不平等、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此外也鼓励社会运动。许多学者则强调历史的核心重

要性，特别是帝国扩张和殖民议题。这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社会。”

Aaula Graham 是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的社会学博士生，说：

“从我研究社运的角度而言，加拿大社会学一词蕴含着解放的意义。我可以理解那些想要辨认何谓加拿大社会学以及巩固学科认同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模糊的认同是有帮助的。我并不跟着欧美的脚步，也不使用其他诠释方法，而是更广泛地去和世界各个角落，包括加拿大，的文献和理论进行互动。”

最后，我们期待与各位相见！让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在会场、酒吧、饭店内辩论知识，我相信这是崭新且刺激的一页。■

References

- Baer, D. (2005) “On the Crisis in Canadian Sociology: Comment on McLaughli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4): 491-502.
- Brym, R. (2003) “The Decline of the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8: 411-416.
- McLaughlin, N (2005) “Canada’s Impossible Scienc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Coming-Crisis of Anglo-Canadian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1): 1-40.
- Nakhaie, R. 2010. “Les 45 années de la Revue canadienne de sociologie (et d’anthropologie). 45 years of th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47(3): 319-325.
- Puddephatt, A. and R.W. Nelsen (2010) “The Promise of a Sociology Degree in Canadian Higher Educ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47(2): 405-430.

> 给主编的信

响应Israeli Universities的Feras Hammami (全球对话3.2)

亲爱的主编：

阅读并比较全球对话 3.2 期 Feras Hammami 的“以色列大学政治危机”一文之后，觉得相当有启发性。André Béteille 说，作为社会学家，他说他的角色并非一位道德家；而 Jacklyn Cock 则从很政治的角度论述，并没有美化或是丑化那些被论述的他者。这并不是因为道德责任不存在，而是因为她并不宣称自己是道德的仲裁者。相较之下，那篇关于以色列的文章，则明显把道德谴责摆在第一位，集中在某些著名的困难个案上，而且只引用运动者的数据。作者没有任何学术或是报纸的资源去左证其观点（这里毕竟是学术发表）。并且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 2 月 13 日已经撤销了原本要关闭 Ben-Gurion University 政治系的决定。

该文把个案诠释成为广泛的现象。的确，右翼团体会抨击大学教授的言论，造成很大的压力（像是 Neve Gordon 的案例），但是文章至少要提供一些其它严肃的证据，像是“为了避免公共毁谤、丢掉工作、送进监牢、甚至死亡，人员请把那些挑衅政府的言论删去”这种宣称从何而来？要说不小心漏掉了，其实有点说不过去。Ariella Azoulay 终身职被拒绝一事，的确饱受批评，而且质疑其政治动机。但是即便如此，作者还是有责任提供讯息来源，因为批评大学有政治立场一言，乃非同小可之事。

此外，该篇文章说到要抵制以色列违反个人自由政治迫害的举动，我认为是有用的，位可以引发大家的道德良知以及让以色列学术界去反思其政府的行动。可是，把全部的大学人员都看作是同一类并加以批评之，这并不合理。运动者若把焦点放在真正可以对政府产生约束力的地方，或许会比较恰当。我并不会反对取消某些以色列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因为很多在 West Bank 出产的商品都被标上“Made in Israel”，这的确是个困扰没错。

和南非的对比则大有问题。在南非，大学和运动组织有明显的歧视政策，但以色列没有。所以整个抵制运动很狭隘，会伤害到专业知识社群，并且把学术进一步政治化。

David Lehmann, Cambridge University, 英国

亲爱的主编：

Feras Hammami 对于以色列大学政治危机的阐述，论及了其学术界的默不作声。多数人选择保持沉默，特别是巴勒斯坦大学的议题上。但是，针对学术自由被侵害的案例，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危机，或许是转机。

以色列政府向来标榜其为在阿拉伯世界中唯一的民主国家，拥有自由的学术环境。虽然其媒体称赞阿拉伯之春，不过讽刺的是其民主与学术自由却出了问题。有一些教授只被少数的异议人士支持，不过却受到国际的大力相挺，这帮助减轻了许多原本会更严重的迫害程度。以 Ben-Gurion University 为例，国际就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去揭露以色列政府对言论自由危害的不闻不问。高等教育委员会已经邀请国际去讨论这个案例，可是，来自以色列复国主义者的巨大压力，其已经把 Neve Gordon 教授视为是反犹主义者，并锁定批判他。

高教委员会屈服于此利益团体的压力，所以在 2012 年宣布关闭该系。不过许多其他教授（除了只有少数来自核心科技中心像是 Weizmann Institute）立即意识到此事对于以色列大学的严重性。一星期内以色列学术界就有 300 人请愿批评该项决定。国际也大力声援。Ben-Gurion University 本身也从法律角度抗议，认为严重违反了学术言论自由。甚者，国际审查会宣称其并没有建议关闭该大学，质疑高教委员会背后的政治动机不单纯。此外，也质问为什么类似的 University of Bar Ilan 就没有被关闭？

饱受抨击的高教委员会延缓了关闭的决议，延后大一月大选后。右翼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执行关闭的决定。二月以色列自由派的媒体 Haaretz 报导关闭的决定已经被取消，而国际团体则声明要继续关注追踪此案。

我们希望的是以色列学术界已经经历到了学术自由被侵害的严重性，并且国际间相当关注且支持学术自由，这点可以让其充分体认到学术自由的不可剥夺，以及巴勒斯坦的学术也需要学术自由。这是个危机中的转机。

Hilary Rose, Bradford University, 英国